

我为前辈学者摄影的因缘

■沈建中

还是前年早春，读了戴燕的《陟彼景山》，随即又读了葛兆光的《余音》，有一种“群像”的感动。不禁联想到手头选编的旧作“20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摄影专题，当初限于能力把采访人物限定为1920年前出生的老前辈，是不得已而为之，假如能有一个安定的拍摄环境，那么现在编入集子的就不止300位前辈了。

《余音》纪念前贤的年代跨度较大，由晚清民国的杨文会、沈曾植写到当代的章培恒和朱维铮等，16位前贤中的周一良、庞朴，我曾有缘摄影；《陟彼景山》谈及的张政烺等先生，我也都曾为其摄影。由此，这两部书在我读来更为亲切，好像敦促我把旧作尽快选编成书。缓慢的劳作，颇有“往日崎岖还记否”之感，引发我回想起昔年为文坛学界前辈摄影之因缘。

说起最初立志拍摄“文化名家肖像”的起因，一定要提到《读书》，可以说正是因为阅读该刊催生了我的这个设想。

常年阅读《读书》，就好像看各路“英雄”纷纷登台亮相，阅读过程等于不断“拜见”老中青三代文化学者，不断了解其专长、成就和思想。该刊作者研究专业和撰文内容取向的交替变化，成了我选择“文化名家肖像”作为摄影专题的直接催化剂，我决心在业余时间寻访文坛学林耆宿，全力以赴投入拍摄。施蛰存老人最先得知我的这个志向后，给予了肯定、鼓励和帮助，可也甚为担心以我的个人能力能否顺利完成这项工作。

差不多同时，《读书》刊出了葛兆光的《钻他故纸，驴年去！》《茶禅闲语》《茶禅续语》，禅意诗趣间充溢智慧和性情，从容雅致，一清如水。最使我难忘的是他的《吾侪所学关天意——读〈吴宓与陈寅恪〉》，“在书斋孤灯下，在考论文章中，我们便只见到两个孤



▲▲本文作者为杨绛（上）和赵朴初（右）拍摄的肖像



独的学者的背影”，并随附照片“青年时代的吴宓与陈寅恪”，文末“我便在这字里行间读到了三个沉重的大字‘殉道者’”。我观读良久，体会到一种史识与深思相融合的画面感，大感振奋，立刻打电话给该刊的编辑吴彬，请她帮忙介绍“为清华大学葛兆光老教授拍摄肖像”。她听后哈哈大笑：“你不是专拍古稀老人吗，葛兆光才四十出头呀。”

《读书》朴素小巧，每月一册，在我寂寞的拍摄旅途中常伴长随。葛兆光的文章对我来说就像加油站，有次读到他的《运化细推知有味》，“一个真正的学者是把对职业的态度提升为一种对生命的精神来看待的”，甚有“励志”作用。我生正逢时，在20世纪末期能为杰出的耄耋之年的专家学者拍摄肖像，如此机遇绝无仅有，应当珍惜。

1992年，《读书》刊登了吴方的文章《斜阳系缆——漫谈历史中的俞平伯》。没多久，我在杭州为

姜亮夫、沈文倬摄影，回程前与程德培一起访书，他确是“荐书高手”，迅疾从书架上抽出吴方“如矿出金”般结集的《世纪风铃》。吴方说书中人物并非“黄钟大吕”一类，即如管间的铁马或曰风铃，风一吹便发出声音，虽然有些寂寞，也是可听的。张中行的“序”论更妙：“识见深，所述多是分量重的，而且有断有论；写得活，常常是鹰隼盘空之际来一些蜻蜓点水。”这本书我很受用，让我能凭借形象的想象来体会吴方笔下的人物。

两年后我冒寒北上，碰巧德培也在那里出差，临走那天中午晤聚后我要去办事，没法随他去小街探望病中的吴方，便相约晚上在机场碰头。晚上登机入座后，德培少有的情绪低落，许久才开口：下午去看吴方，他很淡定，可看他病成这样，我心情极差，头疼得厉害。我闻之黯然，彼此沉默不语。德培1980年代主持《文学角》杂志，与吴方交游殷勤，有次我们

一起到杭州参加文学评论会议，他以钦佩的语气告诉我，才华横溢的吴方由研究现当代文学到研究晚清民国文化，正进一步潜心撰写《中国文化史图鉴》。

1995年初夏，我在北京张政烺寓所采访，想不到张老对摄影兴趣浓厚，把我领进书库，给我看他的相机。一见铝合金箱子我就羡慕不已，这是顶级的尼康F5。他说这是为编《中国历史图集》，他孩子从香港买来给他的。当时我就想到吴方那部大书，同样都是采录文物考古图像史料，概述上自史前下至明清的文化，只是在规模上有明显区别。张老的经历一波三折，“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吴方的《中国文化史图鉴》虽印行，可耗尽心血，我们北京返沪不足一月，便传来他离世的噩耗。每

每想到两位先生的大业之曲折，感伤不已。

我由《读书》而认识了吴方这位擅长“文化人素描”的圣手，他的文章重体验、有趣味，他的厚道朴实、哲思才情和精妙笔法，都让我受益良多。在他的影响下，我亦越来越考究摄影技巧，力求蕴藉悠然岁月感之影调，乃至我的摄影方向和目的、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理想追求，也相对地更为清晰了。

随着拍摄的深入，我觉得自己沿着阅读《读书》一路走来，幸运地形成了自己的摄影目标——把视角定位于采访前辈文人学者，亲炙前辈之道德精神，诚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常有同好问我采访秘诀，我总是愉快地回答：经常和采访对象谈谈《读书》。记得在采访途中，每次只要提到《读书》，总会收获亲切与信任，至今倍感温馨。有次在成都，我辗转找到袁珂寓所采访，老人专长于对历代神话的研究，平日深居简出，寡言少语，但当我谈及在《读书》上看到其作品《〈九歌〉十神说质疑》，他立即喜笑颜开，尽情畅谈。他特别喜欢此刊，每期必读。如今回想，之所以能顺利地顺利完成这项摄影任务，缘于曾主持《读书》的范用先生和吴彬女士的指导与帮助，还有与该刊关系密切的多位老先生的关怀助力，真有说不尽的感激。

我的新书之所以拟书名为“创造者”，也是因为曾在《读书》上看到葛兆光感慨：“为什么那个十年会造就这么多学者，而这十年的辉煌又在我心里渐渐成了一个疑问，这疑问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现在还能再现那种学术的辉煌吗？’”因此，当我在选编这本书时，忍不住仿效自问：“这个世纪还会有这么多‘创造者’吗？”我相信应该会有有的。

文学青年钱伟长

■杨新宇

钱伟长是著名科学家，但他走上科学之路却颇富传奇性。他自述进入清华“是民国廿年，正逢‘九·一八’事变前五天”，但他的数理化和英语成绩很差，据钱伟长的各种传记称，他考入清华是225分，其中中国文和历史两门都是满分，而其他四门总共只考了25分。因为文史成绩优异，他可以在中文系和历史系之间自由选择，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却使他下定决心弃文从理，走科学救国之路。

在进入物理系试读后，钱伟长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成为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日后更成为一代物理学大师。而他在文史方面的天赋，也就像前尘往事一样成云烟了，好在当年清华的校刊上还留下一点痕迹，可以让我们窥见他这方面的才华。

《清华暑期周刊》曾发表过一首他的诗《荷叶上的露水》：

一
荷叶上的露水，
一颗颗的，永远是分散地孤立着，
霍地风来，
它们同归于尽。

二
歧路上的花，
美丽，清雅，
但是，俗世中有没有仙人，
能——它受到赏识。

三
玉泉从山上冲下来，
勇往，猛进，一刻不停留，
半山脚有许多红蓼花，砂石，杂草簇聚在一块儿，很坚固地簇聚着。

玉泉之流几乎被挤住了，几乎停留着了，
忽地拨开红蓼花激开砂石，分开杂草汨汨地出来，

勇往，猛进，一刻不停留；
赶它那光明灿烂的前程。

四
绿柳在牵惹着我，
池鱼在纠缠着我，
一个人为了要静静遂走到荷花池边，
但是，池子里掩映的灯影，和那野风的渺茫迷离，
更使我的灵感掀起波涛，我的神情有所挣扎。

五
霍地醒来，
太阳射满房中，
明晃晃不见一物
凝视着太阳，

霍地移开目光
暗樾樾不见一物。

六
且莫讲你自己的跋涉和劳动，
就顾怜些窗里的我罢！
深夜的两点呀！
并且，——我夜夜所爱恋着的月亮，
亦被你赶跑了。

七
假使天下有情人真个尽成眷属，
这还有什么趣味！

八
未来是不可证实的，
现在是无从捉摸的，
只有过去——呀！过去，
看见窗外的树叶一动，那一动是过去的陈述了，
听见墙上的时钟一响，那一响已是过去的遗音了，
人们就是这样地过他们一生
——看见和听见
……

可惜我抄录此诗时忘记将其发表的期号一并抄录下来，后来再找就找不到资料来源了。但既然是暑期周刊，1931年钱伟长才进清华，也许来不及发表，再后来他已沉浸在科学的海洋中，或许无暇再顾及文艺创作了，因此此诗最有可能是1932年暑期发表的。钱伟长1912年生，考入清华时不到20岁，此诗不可避免地带有青涩的味道，但还是可以看出他的艺术感觉是很细腻的，用他自己诗里的话说，是“美丽，清雅”的。

钱伟长早期诗作的发现，也使我们联想到一个有趣的话题——科学家的文艺创作。很多像钱伟长一样有创作才能的科学家，在早年曾写过一些文艺作品，比如裴文中，他的小说甚至被收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但后来就渐渐搁笔了。但也有一些始终或长期坚持创作的，比如鹤西、丁西林等。

1947年3月23日的《清华周刊》上有一篇《战前清华学生生活——记钱伟长先生演讲》，里面提到钱伟长的演讲：“对于周刊方面分为对内对外两种，对外是文艺性的，当时的编辑者有曹禺、曹葆华（现在在解放区）、李健吾、卞之琳等，对内是副刊，写同学生活情形。看的人很多，不免有黄色刊物嫌疑，如《清华外史》一类的文字，上至教授太太，下至工友小孩都看，但以后跟着时代进步了，而致使地方当局下令禁止出版。”这是另一处关于钱伟长提及文学的内容，因为比较有趣，所以也一并记录在这里。